

稳增长要摆脱对旧模式路径依赖

本报评论员

在经济走弱和对硬着陆担忧上升的情况下,决策层日前做出了“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的回应,“稳增长”迅速成为经济工作的主题词。可以预见,下一步经济政策将会更有作为。

“稳增长”与过去的“保增长”有一字之差,含义也有所不同。前者着眼于增长的健康与可持续性,注重的是增长的内在质量,而后者更是一种特殊经济条件下的方针,它注重的是增长的外在结果,以及不惜动用一切手段的含义。从“保增长”到“稳增长”,显示决策层认识的微妙转变。

目前,虽然“稳增长”理念已为人所接受,但是“稳增长”作为经济指导方针的地位目前看来并不稳固。一方面,从政府到实业与学界层面,一些人对“稳增长”下速度和数量之间有舍有取心里没底,担心“稳增长”使政策出

牌过于保守,隐隐可见“政策力度应更大一些”的催促之声。另一方面,过去“保增长”下形成的路径依赖,诱惑着一些人重新回到那种运作娴熟且能够快速做大经济总量的旧模式上去。尤其是在外需下降内需乏力的当下,很多人还是对“保增长”有一种老情人般的迷恋。

通过及时预调微调化解经济下行带来的一些现实矛盾,缓解市场心理恐慌值得肯定,但预调微调的政策终究是治标的措施,其“稳增长”的效果难以持久。要想实现更长远的“稳增长”,治本之道是进一步深化改革。

就目前来看,大家对经济政策的预期集中在四个方面:其一,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其二,出台刺激消费的政策;其三,加快上马大型基建项目;其四,加大结构性减税以及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扩围力度。除了第四点外,其它几点都是人们所熟悉的老套路。这些政策一旦实施,对提高经济增长率自然

是有用的,但类似于2008年经济刺激计划所带来的诸多“后遗症”也有再度发作的可能。高喊数年的经济转型战略之所以成效甚微,恰恰与这种“后遗症”的消极影响有很大关系。

所以,目前环境下政府必须克制信贷大开闸与基建项目大于快上的冲动,确保稳健的货币政策不变形走样、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至于加大结构性减税以及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扩围力度,则应做到总体趋势是减税,让利于民,切莫通过加加减减所叠加的“障眼法”,反过来加重民众负担,从而将理论上的好事变成实践中的坏事。

政策预调微调本质上是救急之举,不是“稳增长”的长效机制。而且,预调微调在不同时期的反复运用,会形成行政力量干预市场的自我强化效应,使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变成“闲不住的手”。

针对经济下行的压力,“稳增长”着眼点是扩大内需和稳定外需。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稳定外需并不可靠。靠得住的是在扩大内需上做文章。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的高峰时期,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蕴藏着巨大潜力,13亿人口的巨大消费需求一旦充分激活,将为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增长”提供难以估量的驱动力。然而,受制于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税收物流环节抽血过多、物价房价偏高、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股市严重套牢中产阶层等因素,愿景中的扩大内需迟迟难以实现。

不仅如此,由于中国商业道德日益滑坡、假冒伪劣商品泛滥,中国居民跨境消费日益升温,境外奢侈品和日用品都成为国人的抢购对象。出于各种担忧,一些富裕中国人纷纷移民,将巨额

财富转移到国外。这一切,既导致内需的大量流失,也为中国经济的长远健康发展埋下了隐患。

诸如此类的问题,要想通过预调微调来解决,无疑是行不通的,只有通过深化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来从根本上破解。如果说,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30多年的高速增长,是享受初步改革的红利之结果,那么未来中国经济的“稳增长”周期,必须且只能通过享受深化改革的红利来实现。市场化和法治化,仍应成为推进下一步改革的两大价值取向。

应该看到,在政策预调微调之际,推进改革的努力并没有停止。近期,浙江温州和丽水两地金融改革相继试点,资本市场推出了一系列市场化的改革新政,铁道部发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铁路实施意见,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正在国务院层面抓紧制定。我们希望,改革的步伐能够更快一点,改革的力度能够更大一点。目前,世界经济复苏步履维艰,中国经济也有所减速,但这不是我们迷恋预调微调,从而拒绝深化改革的借口,而应成为我们深化改革的历史契机。毕竟,为了将目标从“高速增长”变为“稳增长”,中国已经在热议中准备了两年。而眼下全球经济遭遇的深切痛楚,恰恰为减少中国推进改革所导致的阵痛感,提供了相对不坏的国际参照环境。

深化改革不要在乎一行一业的经济小得失,不必囿于一年一度的政绩小算盘,从现在开始,赶紧打一场深化改革的攻坚战,去夷平垄断阵营的高地,去扩大市场力量的领域,去打破僵化封闭的用人体制,让权力尊重权利,让政府服务民众,让财富公正分配,让人才突破阶层天花板而自由流动起来。改革的勇士们,加油!

■算法经济 Li Bin's Column

市场经济的半瓶醋(三)



李斌

本期的主题是讨论有关企业改革的一些问题。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然而,当国企改革的积极效果日益显现时,改革本身却逐渐停滞下来;一些人开始沉浸在一种洋洋自得的情绪之中,觉得国企发展壮大了,又可以享受一下、挥霍一下、“适当地”走走回头路了。为此,我们首先有必要简短地反思一下如今的成绩究竟是如何取得的。

改革之初所实行的一系列减少行政干预、加强企业自主权的举措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其次,雇工与就业的自由化措施居功至伟。为了建立一个统一的、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千百万国企职工经历了一个痛苦的下岗与再就业的过程,为国企改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项宏伟工程极大地提高了效率。再其次,用算法的观点来看,就是知识积累的因素。在开放市场、引入多种所有制和展开多元化的竞争之后,有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营管理、就业等各方面的知识广泛传播,个人的技能持续提高,最终促使国企由最初的大幅落后于外资企业发展到如今的迎头赶上。另一方面,导致国企状况得以改善的因素中有些并不是十分积极的。比如,国有企业主要集中于传统产业、重工业、能源、原材料等行业中;这些行业目前处于景气循环的高点之上,企业效益好一些是正常的。假如行业低谷来临,相关国企的竞争力究竟怎样,还有待于历史的检验。另一个消极因素,则是部分国企所享有的垄断地位,以及政府部门有意无意之间所给予的种种优待。

需要认识到,我国国有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仍然是相当脆弱的,大多数企业研发创新能力不足,部分企业开支失控。当前的国企改革似乎处于一种思维紊乱的状态中,而在踌躇不前之间,行政干预又有反复之势。例如,在银行、通讯等行业中,在有关企业已经上市的情况下,组织部门对其高级管理人员实行轮岗和对调的措施,本人认为值得商榷。首先,该措施侵害了广大股东的权益。向绩效较差的银行派出能力较强的高管当然是有益的,但是,为了做到这一点,难道就可以把其他银行的高管调离吗?难道绩效较好的银行就有义务接收从其他银行中对调过来的能力不佳的行长吗?难道不能够再从其他渠道补充高管人员吗?显然,这种人事安排是干部终身制、“能上不能下”以及平均主义思想的残余,它向市场传达了非常不良的信息,即国有企业之间相互可以不必竞争。又如,在今年的收入分配改革设想中,要把“金融企业高管过高的待遇”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予以考虑。要进行这种单项治理,必须证明金融企业高管待遇的提高与其业绩改善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否则,这种凭印象办事的做法就是非常危险的。这绝不是细枝末节,而是企业机制的核心所在,搞不好,就会导致国家占小便宜吃大亏。

本人绝非认定当前国企的高管待遇就是“合理的”,而是说,我们需要认识到这里涉及的是更为广泛而重大的问题,即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收入分配问题的解决最终需要依靠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统一而高效的劳动力市场。当年,“下岗与再就业”工程接近尾声之后,原本可以再接再厉,一举促成这一伟业。然而,时至今日,劳动力市场仍然是分裂的,劳动者被分成不同的身份,实行不同的报

■舆情时评 First Response

嬗变的张铁生是一面时代镜子

胡不归

昔日的“白卷英雄”,今天的“财富英雄”。张铁生的嬗变,恰似一面镜子,映射出时代的斑驳陆离。

近日,证监会网站公布辽宁禾丰牧业的招股书。“白卷英雄”张铁生演绎投资神话的故事也因此浮出水面。招股书披露,张铁生是公司的7名发起人之一,持有3224万股。如禾丰牧业顺利上市,张铁生所持股份价值或将超过3亿。

消息甫出,即引发了舆情的热烈反响,据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观察,对于这位昔日“白卷英雄”的华丽转身,人们大体上抱着一一种宽容的心态,这令人感觉到社会的成熟和进步。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个人命运的改变固然是时代变迁使然,但张铁生这个范本还是能够引起不少唏嘘,至少,笔者就产生了如下几层断想:

断想一,资本市场确实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在这里,产生了多少财富神话。从杨百万的孤胆独舞,到创业板的造富运动;从“娃娃股”的横空出世,到市场大鳄的翻云覆雨;从草根人士的积累暴发到权贵资本的孳生壮大……无论你是斗牛小民还是社会名流,无论你是寂寞隐士还是风云人物,只要你肯折腾,这里总能给你机会。但请注意,在媒体对“财富英雄”们的喧嚣背后,是“将功成万骨枯”的无情现实。“一赚二平七亏损”的魔咒,始终在股市的上空盘旋。而恰恰是媒体对“财富英雄”们的追逐和放大,激发了大多数人心内的欲望,最终成为祭坛上的牺牲。对此,我们应保持清醒的头脑——股市有风险,投资须谨慎,这句

话的真谛,你真的领悟了吗?

断想二,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迁。中国有句古语: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一点,在张铁生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在极左年代,他可以因为交白卷而名噪一时,继而在政治上飞黄腾达;而在经历了历史的清算之后,又能够与时俱进,成为经济大潮的弄潮儿;并最终可能借助资本市场的神奇力量,成为万人仰慕的亿万富翁。在华夏大地,这样的例子绝非张铁生一个,史玉柱、余秋雨、褚时健,莫不如是,就连平头百姓,也深谙“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古训,数年前,他们不是总结出了“炒股要听党的话”这样的金玉良言吗?投机,正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这究竟是人性的堕落,还是社会的进步呢?恐怕没有谁能讲得清楚。

断想三,人,能够摆脱经济动物心态吗?计划经济时代走过来的中国人,在经历了商品经济乃至市场经济的大潮之后,才骤然发现,过去的政治狂热,不过都是浮云而已。于是,对财富的追求开始空前的狂热。君不见,如今的拜年语,不是几乎成了清一色的“恭喜发财”吗?当然,逐利乃人之天性,这种变化可以说是过去的一种矫正过正,并且,对物质、财富合法有序的追求,客观上也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尽管如此,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人不仅仅是物质的,最终还是应该得到精神层面的升华。只是希望这个过程不要过于漫长。

张铁生的嬗变以及它引发的种种议论,不过是社会心态的一种真实的反映,无需大惊小怪。无论曲折坎坷,社会的脚步终归是向前的。
(作者系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观察员)



唐志顺漫画 孙勇/译

证券市场藏鬼魅,内幕交易可治罪。司法解释定细则,法律裁决有依归。投资权益当维护,监管力度要到位。交易平台共建,三公原则莫违背。

及时制定欧元区有序退出机制

陈东海

过去那些强烈否认希腊退出欧元区和欧元区破裂存在可能的人,现在不那么理直气壮了。欧洲央行已经改口了,欧盟部分领导人已经公开表示在研究希腊退出的问题,欧盟领导人也开始公开讨论这些事情,甚至欧洲一些银行在为希腊退出欧元区和起用新货币进行测试。

可以大胆预计,希腊退出欧元区只是时间问题。希腊暂时留在欧元区虽然避免了短期对希腊、欧洲和全球的巨大冲击,但其经济再无重生的希望,因此最终必然还是离去,而且负面作用更大,只是把更坏的结果留给了未来而已。所以,留在欧元区这条“船”上等于是慢慢等死,而退出欧元区反而是断臂求生。

之所以政治家不敢让希腊现在就退出,是因为没有人敢为短期的巨大冲击负责。同时,希腊退出欧元区意味着过去数十年来欧洲一体化的重大挫折,而这可能断送目前在台上的和准备上台的领导人的政治前程。虽然希腊退出欧元区甚至欧元区解体有利,但这种有利结果要十几年或者几十年才看得出来,没有人愿意拿目前利益去交换未来的历史名声,所以目前欧盟一些人能拖一天算

一天,寄希望于侥幸。

短期来看,希腊退出的冲击确实非常大。从直接损失上来说,如果希腊直接废债的话,那么希腊现在欠下的2000多亿欧元债务将基本上打水漂,而这些债务是法国和德国等欧洲国家银行的较多。根据摩根大通的计算,最直接的损失就是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握有的价值2400亿欧元的希腊债务,还有就是TARGET2系统(欧元区各国中央银行之间的支付系统)中1300亿欧元的希腊风险敞口以及欧洲银行业约为250亿欧元的潜在损失。希腊废债以及其他重债国家可能的连锁废债反应,将会使欧洲银行业受到致命打击,进而将欧盟和全球拖入深水区内。即使希腊不明确宣布废债,但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无力还债,债权人的权益实际上虚置。

欧盟领导人更怕的是连锁反应。如果希腊退出欧元区,将直接打击市场对于所有欧元区国家(除德国外)的信心,那些重债国将无力再融资,很快就面临违约。第二个直接打击就是,希腊一旦退出欧元区,除了让数千亿援助欧元区甚至欧元区解体有利,将等于宣布三驾马车(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央行)的援助机制破产,那么对于其他国家的援助就不再可信,也不可能。连锁反应

下,其他国家需要的援助可能会数倍于对于希腊的援助,这是德国根本就无力承担的,这种情况下,欧元区立即解体都有可能。

那么,在不敢让希腊立即退出欧元区的情况下,希腊还会被挽留在欧元区一段时间。而在这段时间里,有智慧和有魄力的欧洲领导人还是可以去做很多事情,如果运筹得当可大大减少退出的巨大冲击。

目前情况下,成员国退出之所以会让欧盟和全球都无法承受,是因为欧元区体制只能进不能出。一个体制如果不能进不能出,则必然是一个死亡机制,这根据“舆论”和“耗散结构论”可以推断出来。也就是说,一个只能进不能出的机制是个“贼船”,加入其中的成员结局必然不妙,如果企图求生则必须退出,而退出则只有使用无序的、打碎旧体制的办法。欧盟一些人后悔为什么当初没有为欧元区设置退出机制,那么在目前退出尚未发生时,应当赶紧亡羊补牢,为欧元区设计一个退出制度,包括退出路径和待遇等等。

要设计欧元区退出机制,重要一点是对退出机制和退出国抱有善意。目前一些欧盟的人担心,一旦希腊轻松的退出欧元区,或者是冲击不大,未来会让

其他成员国也无惧退出,退出者会如过江之鲫。所以前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曾经威胁:凡是退出欧元区则必须同时退出欧盟。这种以恶意和惩罚方式对待退出者的机制,正印证了该机制的“贼船”性质。

正确的做法是,设计一个正常的退出机制,为退出成员国提供方便和支持。不管是希腊,还是其他某个成员国,一旦决定退出欧元区,欧盟成员国地位应当保留,为防止退出国经济崩溃,在短期内还可以提供流动性等支持。这样成员国有序退出,金融和经济逐渐走上正轨,其所欠债务未来还有逐渐偿还的可能,也基本上不会对其他成员国和整个欧元区产生重大负面冲击。如果设置高门槛阻止成员国退出,那么一旦成员国真正退出,必然会有毁灭性影响。一个能进能出的体制,其成员退出造成的冲击反而可控。这点当为欧盟和欧元区机制设计者所重视。

因此,欧盟应当抢在还没有成员国退出前就设计出一个制度。通过有进有出的整合,欧元区的同质化会提高,欧元区的稳定性反而可以提高,融资成本也会降低。这样欧洲的一体化反而可能稳步推进和稳固。

(作者单位:东航国际金融公司)